

## 我的答謝

● 劉青峰

各位尊敬的來賓、同事、朋友：

我很少也不善於在公開場合講話。但在今晚這樣一個特定場合，面對在座的數十位香港中文大學同事和學界朋友，特別是從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廣州、台北遠道而來的朋友們，我想講幾句心裏話。

事實上，從2000年起，我就開始積極考慮《二十一世紀》交班的事情，但屢屢嘗試，卻因為諸多因素而未有結果，以致拖延至今。今天，在慶祝《二十一世紀》出刊100期之際，我也終於可以移交這一擔子了。此時此刻，我想起在1970年三月初北京那個多雪的早春，我離開北京大學前往雲貴高原貧困山區，投身社會時的情景。當時，說甚麼也想不到，我會在香港這個借來的城市、在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借來的辦公室中，一坐就是十八年，直到退休。回首三十多年職業生涯，我當過中學、大學教師；從1978年至今，就一直以編輯為主業。作為編輯，我要與不同專業、不同地區、性格各異的作者交往。他們之中，有我尊敬的師長，如楊振寧先生、余英時先生這樣世界著名的學者，也有尚在讀書的莘莘年輕學子。承蒙作者、讀者和編委以及同事們的厚愛與合作，令我在廣泛的交往中獲得那麼多知識、見聞和真情，這是我深以為幸的。今晚，我要向在座的、不在座的作者、中大同事、編委、學者和朋友，特別是在這十七年裏先後與我共事的《二十一世紀》編輯室的同事們，說聲多謝。

但是，知我較深的朋友大概都了解，編輯這種職業並不那麼符合我的本性。我也問自己，對不那麼符合自己本性的編輯職業，「我怎麼可以一做就是近三十年？」也許，這是一種不能與我人生經歷割裂的命運吧。我經歷過文革，那些產生於青春時期的夢想和追求，早已內化為我生命的底色。這種追求，推動我在文革結束後積極投身於思想文化啟蒙運動。1980年代末，當自己積極參與的文化事業被政治事件強行中斷時，觀濤和我恰好又在中大訪問滯留。漸漸冷靜下來後，我清楚地意識到，既然注定要承受流亡，如果想要延續以往那種有目的的、有精神的生活，就需要一種有信心、並能夠堅持下去的行動。對於在香港完全沒有根基的異鄉人來說，社會行動又談何容易。十分幸運的是，在我們人生轉折的這一重要關頭，適逢高錕校長、金耀基校長、陳方正所長領導中大和中國文化研究所。有這樣卓越的校長和所長的真誠支持、關心和積極參與，搭建了《二十一世紀》雜誌這個思想學術交流平台，使我可以在「為了中國



的文化建設」這一共同目標下，對辦刊做出自己的承諾和點滴貢獻。今晚，我特別要向高錕校長、金耀基校長、陳方正所長說聲多謝；我還可以對你們說，十七年來，我信守了當年的承諾。

今天，《二十一世紀》雜誌有了新的主編，我深知，顧昕接過去的擔子不是很輕的。當今，並不缺乏專業性學報和消費娛樂雜誌，但辦好一份以學術為背景的綜合性思想性雜誌，學術以外，還需要思想的支持；而思想的討論和傳播又必須以公眾對思想的熱忱為燃料。在二十一世紀中國，市場和物質生活空前繁榮，到了令人驚歎的地步，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思想探索已失去以往的魅力。這種狀況，令我想起一百年前韋伯的感慨，他說「我們這個時代的宿命，便是一切終極而最崇高的價值，已自社會生活隱沒」；他還說「在今天，唯有在最小的圈子裏、在個人與個人的關係間，才有某種東西，以極微弱的調子在搏動」。我想借用韋伯的話來說，在今天，這「最小的圈子」就是那些如《二十一世紀》一類、十分稀少、仍然堅持注重思想的刊物和刊物的朋友；那種「以極微弱的調子在搏動」的，就是一息尚存的對思想的注重。在人的一切自由中，最重要的是思想和思想表達的自由。一旦失去思想的興趣，學者就會滿足於愈來愈細的專業發表，而失去創造活力和公共關懷。儘管如此，我還是用我為《二十一世紀》創刊十周年寫的〈十年回眸〉一文結尾的幾句話，送給我的繼任者，並與在座的朋友共勉：「在一個思想和社會參與意識退潮的時代，辦一個思想性學術雜誌，從一開始就注定是一場艱難的苦鬥。問題在於，如何看待這種苦鬥。事實上，正是對這種現實的抗拒，代表了不依賴於政治、大眾和市場的批判反思意識的成長和尊嚴之所在。」

最後，我要再一次感謝各位尊敬的來賓、同事、朋友，特別是遠道而來的朋友，真誠地謝謝各位。